

美國新聞媒體的尷尬境況

● 木令耆

James Fallows, *Breaking the News: How the Media Undermine American Democracy* (New York: Pantheon Books, 1996).

當今美國新聞媒介正處於一個特殊尷尬的境況，而美國社會也陷入新聞泛濫的局面。如果透過新聞媒體來理解美國社會，人們便將發現它是混亂、精神分裂的。從政治的統治體系，以至於普羅大眾生活其中的社會，新聞媒體反映了一個混沌、雜亂的世界。

當前美國新聞媒體最關注的是新聞效益，因此從白宮的「隱藏」陰謀、國會的票選買賣勾當、最高法院的色情新聞、軍隊的男女色情犯罪，一直到小市民家庭的光怪陸離，只要有「賣點」、能引起社會轟動，媒體便會爭相報導。總之，天下本有事，庸人益擾益亂，這正是美國社會及其媒體的最佳寫照。

當前美國新聞媒體最關注的是新聞效益，因此從白宮的「隱藏」陰謀、國會的票選買賣勾當、最高法院的色情新聞、軍隊的男女色情犯罪，一直到小市民家庭的光怪陸離，只要有「賣點」、能引起社會轟動，媒體便會爭相報導。

前《大西洋月刊》(*The Atlantic Monthly*) 主編、現為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》(*U.S. News and World Report*) 主編(兩個刊物均屬同一家出版社)的法洛斯(James Fallows)，其在1996年出版的新著《號外新聞——美國民主怎樣被新聞媒體破壞》，無疑是剖析美國媒體現狀的力作。法洛斯認為，美國民眾一向喜愛新聞界，可是根據近期民意測驗，今日的新聞媒體卻引起民眾的憎惡與懷疑，原因是新聞媒體已經變得極其傲慢自滿，而且充滿破壞力量。法洛斯說，這種現象對新聞媒體與民眾均有不良的影響：一方面是美國民眾得不到準確的新聞資訊，從而無力應付新的社會潮流趨勢；另一方面，新聞媒體，不論是印刷媒體或是電視媒體，將不斷地失去聽眾讀者的信任。

法洛斯認為，新聞媒體之所以發展到現今的局面固然與新聞記者的素質有關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新聞受歡迎的調查定值程度不停地對新

聞媒體施加壓力，這是市場經濟對新聞界造成的最大衝擊。新聞電台的經濟來源大部分依靠廣告客戶，因此新聞媒體製作的新聞節目是否受歡迎就變得非常重要，因為讀者觀眾的人數越多，便表示它越能賣錢。

此外，作者又認為，新聞媒體現今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。觀眾的無知或誤解來自於嘩眾取寵、不盡不實的新聞報導，但由於文化品味低俗的觀眾歡迎此類報導，新聞媒體不得不迎合大眾化趣味而降低報導的質素，因此，在媒體與大眾之間產生了一種令文化水平下降的互動作用。以往，主流新聞媒體從不理會黃色小報的新聞，但時移勢易，今日黃色小報新聞媒體卻獨領風騷，譬如總統競選時的色情醜聞均是由黃色小報率先報導，然後才轉入《紐約時報》、《華盛頓郵報》等大報的。

為甚麼今日新聞媒體會誤入歧途呢？法洛斯提出了幾個可能因素，概括如下：

(1) 逃避責任。新聞記者以為自己的報導具有客觀超越性並擁有無限的自由，因此對新聞報導的結果不負有關責任。一般記者的態度是：搶先報導，不去查究事件的真相或後果。

(2) 為了應付演出的壓力，電視新聞漫談節目的主持人常常無中生有的談論事件。有些電視新聞明星在私下談話中對某個題目一無所知，可是當他面對電視攝影機時，卻說得有聲有色，令人嘖嘖稱奇。

(3) 民眾要求新聞的真確性，

他們關心的是「甚麼？」，而新聞記者卻注意事件會引起甚麼樣的注意與影響力，亦即是說怎樣才能引起聽眾、政府的反應，以及會產生怎樣的作用(多是反面作用)。因此，新聞記者要求的不是「甚麼？」而是「怎麼樣？」。

(4) 新聞記者拼命的「鑽牛角尖」。新聞記者不斷鑽挖一件時事的政治性，有時甚至是神經過敏的挖，而不注意事件的本質。

(5) 新聞媒體被所謂的民意測驗專家、政治諮詢專家、「政治先知」，或美其名的「政治分析專家」所霸佔。

(6) 白宮記者們已被華盛頓特級精英內圍同化，他們的報導幾乎完全靠賴白宮的餵食，這些華盛頓新聞記者也是華盛頓社交圈子中的活躍份子。

(7) 新聞記者閉守在辦公大樓，居高臨下，再加上新聞明星記者享有高薪(如唐納森 Sam Donaldson 的年薪是二百萬，另一位記者明星年薪高達七百萬，他們不但年薪高，並有高酬金的演講費，科佩爾 Ted Koppel 的演講費是五十萬一講。這些所謂的pundits，其身價要比 talking heads 的高)，都使他們與民眾隔離。

(8) 與大眾脫節的新聞記者很容易失去群眾的信任，從而令他們的報導立場受到質疑，因為這些新聞記者早已自成一派一黨，享有特殊利益。

書中最重要的一章是討論有關新聞與民主的問題。一般來說，對美國新聞媒體的分析有兩學派，一

新聞記者以為自己的報導具有客觀超越性並擁有無限的自由，因此對新聞報導的結果不負有關責任。一般記者的態度是：搶先報導，不去查究事件的真相或後果。

對美國新聞媒體的分析有兩學派，一派以李普曼為代表，強調新聞記者亦必須專業化；另一派則以杜威為代表，認為政府與新聞界有責任提供訊息，以幫助民眾參與社會活動。這兩派的爭論圍繞著一個重點，那就是政府與新聞界對社會應有甚麼樣的態度和責任。

派以李普曼 (Walter Lippmann) 為代表，另一派則以杜威 (John Dewey) 為代表。由於新聞媒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起的重要作用，李普曼覺得世界和社會日益複雜，所以不能再使用舊日的大眾化民主，而新聞記者亦必須專業化，以便積極領導新聞的傳播程序。雖然李普曼的觀點在晚年稍有更改，可是由於他的名望權威，他早年的影響已起了作用，至今未改。譬如從前新聞記者的工資近乎藍領工人，可是今日的記者多是長春藤學院或是專業學院的畢業生，他們多成長於象牙塔，日後高居玻璃大廈，這也可解釋為甚麼記者常有傲慢、目中無人的姿態。

與李普曼的觀點不同，杜威認為民主社會需要公民不斷積極的干預，因此政府與新聞界有責任提供訊息，以幫助民眾參與社會活動，如果民眾得不到真確訊息，或逐漸失去對社會的關切，那是新聞媒體的失敗。

這兩派的爭論圍繞著一個重點，那就是政府與新聞界對社會應有甚麼樣的態度和責任。杜威認為民主的重要性在於不能讓政府與新聞媒體操縱訊息傳播，因為他們的責任是客觀報導而不是領導新聞傳播。

法洛斯認為，現今的新聞媒體既可採納杜威的原則，亦可顧及李普曼的立場。李普曼認為新聞界不應跟隨民眾趣味，因為新聞媒界的責任是要教育、開導民眾；尤其李普曼派的新聞記者班子多是專家出身 (如科學新聞報導、經濟報導、醫

學新聞報導等等)，更應負有這個使命。

法洛斯認為李普曼學派最大的危機，是會令新聞媒體逐漸趨向傲慢自滿。記者的報導常常變成自說自話，日漸脫離群眾。他們的報導往往針對政府、權威階級或是其他記者群，這是現今美國新聞媒體的趨向和失誤。杜威早年對新聞媒體的顧慮，今天已在美國社會出現。

因此，法洛斯認為當今美國新聞媒體會對民主造成威脅。民眾懷疑政府、懷疑新聞媒體，認為新聞媒體不關注民眾的利益，只把目光聚焦在華盛頓。由於新聞媒體漠視民眾的意見，民眾因而無法真正參與他們處身的社會，政府官員亦因此無法聽到民眾的聲音，從而堵塞了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溝通渠道。新聞媒體之所以失去了公民精神，是因為新聞媒體與政府圈子糾纏一起。

法洛斯覺得新聞媒體對民主公民精神最大的威脅是它失去了責任感，媒體常對公民、對政府採取極端的自我態度，並煽動民眾挑戰政府的權威。由於來自華盛頓的訊息大半是負面的，民眾因而對政府失去信任與興趣。

法洛斯在研究新聞報刊的過程中發現，許多地方報刊在建立民主精神方面其實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。這是因為地方報刊與當地居民保持直接聯繫，它們不但關切居民的利益，也報告地方的實情，而不去理會政客的興趣。法洛斯對地方新聞報刊的公民民主精神寄以厚望，因為只有它們才能真正表彰新聞媒體的道義與責任。